

《玉台新咏》三题

跃进

一 《玉台新咏》的编者及其成书年代

《玉台新咏》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题曰“徐陵撰”。《艺文类聚》卷五十五也题此书为徐陵所撰。两书均成于初唐，尤其是《艺文类聚》的编者欧阳询乃是陈代官员欧阳纥之子。欧阳纥于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因叛陈被杀，欧阳询“以年幼免”（《陈书·欧阳纥传》），从这一年起至陈亡，还有十九年的时间。而徐陵之死在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就是说，570年时，欧阳询尚“年幼”，至583年又过去了十三年，徐陵死时，欧阳询已经成为青少年。这时的徐陵，官位文名均显赫一时，可见欧阳询对于徐陵的情况是不会弄错的。因此，《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当是信而有据的。只是有几个问题令人将信将疑。首先，徐陵编《玉台新咏》不见于《陈书》的记载。《陈书》主要编者姚察与徐陵为同僚，两人同为江总好友，应当有所过从。^①如果《玉台新咏》确系徐陵所编，姚察编《陈书》时似不应有所遗漏。再者，现存版本系统比较紊乱，在传抄传刻过程中，有意无意加以附益，结果失去原来的面貌。在明代刻本中，像吴兆宜注那样的版本，竟比宋本多出多达二百多首诗。书中称徐陵为徐孝穆，而不称名。这些都使人感到困惑。自明代以来，就



有人怀疑此书非徐陵所编。不过我们后面还要谈到,《玉台新咏》的版本系统极为混乱,仅仅据版本推翻传统的说法,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主张还是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确定《玉台新咏》的编者为徐陵。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唐前还没有发现论及《玉台新咏》的文献资料。唐代论及《玉台新咏》成书年代问题的材料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开元天宝年间李康成所著《玉台后集序》,详见于宋人《郡斋读书志》著录:

《玉台后集》十卷。右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序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既为异代,理不可遗。”

又《玉台新咏》条也引录有李康成序:“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且为之序。”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也提到了此书:

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往往其时诸人之集尚存。^②

另外一条材料见于中唐时刘肃所著《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其中也提到《玉台新咏》: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臣,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乃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这是考察《玉台新咏》编录时间、编选目的、编撰体例的最重要材

料,而且它实际上业已成为研究《玉台新咏》成书年代问题的起点。现代学者根据上述材料,均认为《玉台新咏》成书于梁代。还有学者根据《法宝联璧序》所列三十八位编者的排列次序,把《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限定在中大通六年前后。^③

平心而论,现存文献资料和版本资料颇多问题。比如版本资料,现在多数学者主要是根据明代寒山赵均覆宋陈玉父刻本来考论《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但是这个版本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陈玉父所据之本已非完帙,而是两个本子拼凑起来的。从现存文献来看,《玉台新咏》在宋代已有不同的传本,而且相差较远。歧义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后五卷。这本身就容易使人怀疑,宋本《玉台新咏》恐怕也早已失去徐陵原本旧貌,甚至也不是唐代流传下来的版本系统。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像陈玉父那样拼凑起来的宋本今天业已不得一见。^④学术界评价甚高的赵均覆宋本,实际已被改动。自然又失陈本之旧。就现存赵刻而论,其编排颇有不可解者。对此,我在《关于宫体诗研究的几个问题》(本刊1994年第3期)已经做了扼要的论述。那篇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徐陵在萧纲文人集团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从萧绎《法宝联璧序》所附编者名单来看,当时年仅28岁的徐陵并未介入这个文人集团的核心。年仅22岁的庾信也是如此。当时两人不过是东宫侍读。有什么资格来品评筛选前辈诗人的作品呢?《法宝联璧序》所附38位编者的名单,仅有六人作品选入《玉台新咏》,他们是:萧绎、萧子显、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从诗人年龄来看,当时,刘孝绰、王筠均54岁。萧子显、庾肩吾均48岁,刘孝威38岁。最年轻的是王训,25岁。但是王训的出身为当时第一高门,是琅琊王氏后裔。其父王谏,祖父王俭。很早就有令名。他们的作品如何选定?这38位作品,并非仅仅这六人有文学才能。比如兰陵萧子范,唐朝李康成编辑《玉台后集》就始于此人,足见其人其文在历史上还是很有影响的。另外如王籍、到溉、刘显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家,直到今天仍有作品流传,无视他

们的存在,无论如何都难以讲得通。特别是不选徐摛的诗,更是一个重要疑点。且不说徐摛是徐陵的父亲这重亲情关系,就其诗歌创作以及他在萧纲文人集团中的地位和影响来说,《玉台新咏》以他的诗为中心都不过分。从《梁书·庾肩吾传》《徐摛传》的记载可以知道,宫体之名由于徐摛的创作而起,可是为宫体诗张目的《玉台新咏》却不选他的诗,这确实使人难以理解。《梁书》本传说,徐摛之被重用,使得领军朱异不悦,故遣为新安太守。《法宝联璧序》载徐摛官位为“新安太守前家令”,说明此时已不在京城。退一步说,《玉台新咏》恰如时论所说编于中大通六年,此时徐摛不在京城,一时漏选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徐摛直到侯景之乱中的太清三年才死去,而且是死在京城。从中大通六年到太清三年总共有十六年时间,徐陵应当有机会与父亲见面,应当有机会收集到父亲的诗歌。可是一首不选。这不像是避贤,因为他连自己的诗都收录在内,而且不像是后人所加。因为唐朝李康成《玉台后集序》说:“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既为异代,理不可遗。”从刘克庄《后村诗话》所引《玉台后集》中的诗来看,李康成也像徐陵一样收录了自己的创作。这说明唐朝李康成所见《玉台新咏》收录了徐陵自己的作品。

由于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写到:“这就提示我们,有关《玉台新咏》赵本的版本价值似应予以重新估定,《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问题更应给予重新考定。”所谓“重新考定”,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对《玉台新咏》编于梁代的传统说法表示怀疑。当然,这种怀疑在没有充分的根据之前是很荒唐的。至少现存有两条唐代的材料说明《玉台新咏》成于梁代,他们毕竟离徐陵的年代比我们要近得多,所见到材料当然也比我们多得多。可是,李康成毕竟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人物,距离徐陵辞世的至德三年(585)至少有一个半世纪。而刘肃中唐人,今本《大唐新语》有元和丁亥(807)作者自序。则刘肃距徐陵的时代已有二个世纪。而他们

所见到的材料经过侯景之乱、江陵之乱以及隋末之乱已经残缺不全,所以,他们的记载虽不失为最重要的参考材料,却未必就是铁证。从徐摛的生平来看,他除了任新安太守外,直到太清三年死,后半生主要是在东宫度过的。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宫廷内部流传,这些作品,正如徐陵序所说“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属于深宫之秘籍。如果《玉台新咏》成于梁代,徐陵应当是有条件看到这些作品的。但是现存所有的《玉台新咏》的版本都没有收录徐摛的诗,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徐陵在编辑《玉台新咏》时没有收集到父亲的作品。而这种可能只能发生在梁代后期两次严重的毁书事件后。一次是侯景之乱,一次是江陵之乱。尤以后者为惨剧,书籍被毁多达十五万卷。这在《隋书·牛弘传》、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等许多唐代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徐摛文集很可能在这两次毁书中消亡。《梁书》《隋书·经籍志》中都没有著录徐摛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徐陵在陈初搜集前代诗歌已邈不可得,所以编辑《玉台新咏》时无从收录。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实。

二 《玉台新咏》的性质及其文学价值

《玉台新咏》是一部诗歌总集,历来的史传目录均归入集部总集类,自是题中之义。唯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例外,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古乐府》并列收入乐类中。这种分类似本于唐朝李康成。李氏《玉台后集序》称:“昔陵在两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晁公武著录《玉台后集》时说:“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这里,说《玉台新咏》收录的是“乐府艳诗”,《玉台后集》收录的是“乐府歌诗”,强调的都是“乐府”,即从入乐的角度来看《玉台新咏》。以往论及《玉台新咏》的特点,往往关注所收诗歌的描写内容,即以女性为主,而忽

略了这部诗集的入乐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玉台新咏》实际上是一部歌辞总集。这一点与《文选》迥然有别。我们看《玉台新咏序》,所论多与歌辞演唱有关:

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阉氏览而遥妒。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馥娑,聘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

可见,《玉台新咏》之编录,本意在度曲,而非像萧统那样有更多的目的性。作为歌辞,而不是案头的读物,所以《玉台新咏》所收的诗歌,在内容方面主要是以歌咏相思离别为主要题材,而不可能像《文选》那样总是表现较为严肃凝重的主题。在形式方面,更是注重自然流丽,便于传唱,而不可能过于雕琢。这些都是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的。譬如卷三所收晋杨方《合欢诗》,卷十贾充《与妻朱夫人联句》、孙绰《情人璧玉歌》、王献之《诗二首》、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等都是典型的对歌,其体裁为一酬一答,各唱两句或四句,每句为五言。如贾充与夫人联句,贾先唱五言两句一联,夫人唱两句答联;贾又唱两句一联,李再答;贾再唱。李再续。内容是互相保证:贾说:“我心子所达,子心我所知。”李说:“若能不食言,与子同所宜。”全诗六联十二句六十字。又如谢灵运诗,只有一酬一答,每首四句,每句也是五言,也是男唱女答。杨方《合欢诗》也是俩人作品,一酬一答,每联意义相当。体裁是当时盛行的五言。^⑤把握住《玉台新咏》的这种特殊性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把古乐府列在卷首的原因了。最后一卷是绝句,也是古乐府列于卷首。根据这种特殊的性质,我们有理由断定,通行本将

繁钦《定情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排在第一卷《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之前,从体例上说是是有问题的。而明代郑玄抚刻本系统将二人诗列在卷二,似更符合于徐陵的原意。

因为徐陵是从乐府的角度收录古代诗歌,所以,《文选》中许多遗漏的重要诗歌得以入选,比如吴声歌和西曲歌还有大量的文人拟乐府,多赖《玉台新咏》的收录而保存下来。比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曹植《弃妇诗》、庾信《七夕诗》等就仅见于本集。另外,许多传世已久的作品,也可以用此集作为校勘,或研究文献。比如书中所收苏伯玉《盘中诗》,《玉台新咏》诸本的排列颇有歧义,这是我们考证这首诗年代最主要的依据了。又如古诗十九首中有九首诗收在《玉台新咏》中,题作枚乘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资料。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部诗集主要是从入乐的角度收录作品,所以在声韵方面较之《文选》就更为讲求,这对于我们研究齐梁诗向隋唐近体诗的演变,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在诗体方面,卷九主要是歌行体,卷十是五言绝句,而古体向近体的演变,除了声韵方面的讲求外,最重要的特征莫过于句式的定型了。《玉台新咏》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作品。

三 《玉台新咏》的版本

《玉台新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石室中所藏唐写本。收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起张华《情诗》第五篇,迄《王明君辞》,凡五十一行,前后尚有残字七行。书题已佚,据所录诸诗,都在《玉台新咏》第二卷之末,其次第与今各本相同,由是知为《玉台新咏》残卷。值得注意的是,潘岳诗之前,此本先题“潘岳诗四首”下小字夹注“内顾二首,悼亡二首”,其《内顾诗》前别出题目,《悼亡诗》前亦然。由此而知《玉台新咏》的体例,先题作者姓名及总篇数,下分注各篇篇题篇数,每诗之前仍各冠以本篇题目。今本则但书潘岳《内顾诗二首》,而总篇数及小注皆削去。赖此本保存旧例。现存刻本

以五云溪馆铜活字本为最早。《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禄天藏本印影。现在流传最广的是明代崇祯寒山赵均覆宋陈玉父刻本,此本历来为藏书家所珍重。如邓之诚跋称:“艺风丈昔年见语,世贵赵刻如宋元,其直昂甚,不可问津”。不过,据目验过宋刻的冯班说,“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更何况,陈玉父跋称此本原本残存五卷,后五卷是据另一抄本补缀而成。因此,即使赵均刻本如叶启发所说,“刻板古雅,规矩谨严无明人刻书窜乱臆改恶习”,也未必可称为今存《玉台新咏》诸本之首屈。古籍刊行社 1955 年据以影印,较易索读。此外还有明代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正编十卷,续编五卷。明代嘉靖二十二年张世美刻本。万历七年茅元祯刻本。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以及汲古阁刻本等。在版本研究方面用力最深的,当首推《玉台新咏考异》。此书广泛参考了清前众多版本,详加考订,比勘异同,纠正了宋明以来诸本许多错误,在《玉台新咏》校勘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书收入《四库全书》中,题名纪容舒。而北京图书馆藏有纪昀《玉台新咏校正》稿本,与《考异》相校,除序文略有差异外,其余全同。不知纪昀出于什么目的把自己的著作换上父亲的名字列入《四库全书》中。此书有多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注本唯一部,即乾隆三十九年由程琰删补刊行的吴兆宜笺注本。此本把每卷中明人滥增的作品退归每卷之末,注明“以下诸诗,宋刻不收”,颇为后人称道。此外,作为《玉台新咏》唯一的注本,引证详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中华书局 1985 年校点排印出版。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①《陈书·江总传》载:“总为詹事时,尝制《登宫城五百字》诗,当时副君及徐陵以下诸名贤并同此作。徐公后谓江曰:‘我所和第五十韵,寄弟集内’。及江编次文章,无复察所和本,述除此意,谓察曰:‘高才硕学,遮光拙文,今须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谦逊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制,付诗亦须弃本,复垂徐公所寄,岂得见令两

失?’察不获已,乃写本付之。”其时为陈宣帝太建五年(573),江总五十五岁,徐陵六十七岁,力主吴明彻率兵北伐。三月出兵,作《为护军长史王质移文》《移齐文》《谢敕赉烛盘赏齐国移文启》等。十月攻克寿阳城,斩王琳,传首京师。高宗以荐举之功,加徐陵为侍中。名重一时。这些俱见《陈书》本传。足见徐陵与姚察之关系并不浅。

② 李康成绩集又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題》著录。《新唐书》作李康。但在李康名下同时又著录有《明皇政录》十卷。傅璇琮、张枕石、许逸民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以为撰《明皇政录》之李康似为中唐时人,而天宝时之李康似非一人。又《唐方镇年表》还记载另一李康,唐顺宗永贞元年为东川节度使。《全唐文》卷358收录李康成文一篇,小传称:“康成,天宝时人,尝使江东”。《全唐诗》卷203收录李康成诗五首,其中《自君之出矣》及《河阳店家女》末句“因缘苟会合”云云亦收录,知此李康成即编《玉台后集》者。作者小传云:“李康成,天宝中,与李、杜同时。其赴使江东,刘长卿有诗赠之。尝撰《玉台后集》。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自载其诗八篇,今存四首”。此约略《郡斋读书志》而言。

③ 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玉台新咏〉成书考》(译文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出版社1985年版)将萧绎《法宝联璧序》后所列三十八位编者名单的排列次序与《玉台新咏》第七、八两卷作了比较,发现三十八人中有六人见于《玉台新咏》,即庾肩吾、萧子显、刘遵、王训、刘孝仪,且排列次序全同。再看卷九所收杂言诗,所据原则当与此前五言诗部分相同,最初是从汉代到梁代,按照时代逐一排列,但是到了梁代中途皇太子圣制诗出现后情况便发生变化,成为由皇族而臣下的顺序排列。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法宝联璧序》中三十八人是按各人在朝廷的地位排列的,而《玉台新咏》卷八正是将《法宝联璧序》中还活着的人按照地位的高下相随排列。《法宝联璧序》有明确的记载,作于梁中大通六年。因此,“《玉台新咏》卷七、八是在距中大通六年前后不久的时期进行编纂的,收集了当时还活着的人们的作品”。沈玉成先生在《宫体诗与〈玉台新咏〉》(载《文学遗产》1988年6期)中说:“或者还可以扩而广之,说全部的《玉台新咏》编定于中大通五六年间,至少我个人认为可成铁案”。

④ 有清一代,宋版犹有流传,而且还不止一部。王士禛《香祖笔记》称“此集余在京师曾见宋刻,今吴中寒山赵氏翻刻本可谓逼真”。又,《天禄琳琅书目》也著录了四部宋刻。前集“宋版集部”卷三著录了两部宋刻,于敏中称:“前陵序,后宋陈玉父序。永嘉陈玉父后序称《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所云旧京本,当为北宋时所遗而此乃重刊于南宋者。陈玉父无考。按宋永嘉陈埴、陈宜中诸人,或以道学称,或以风节著,则知永嘉陈氏系宋望族。玉父之刻是书,鏤校周详,摹刻精好,亦可谓深于好古,不坠家声矣”。另一部“与前部系出一版,密行细字,仿巾箱本式而尺寸加盈,制极精雅,其摹印亦属良工,故清朗照人,可谓合璧。明王鏊藏本,有济之印”。又“后集”卷七又著录了另外两部,彭元瑞称“诗前有陵自序,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跋。是书明代刻本增益颇多,此本真宋槧可信”。第二部“同上系一(下转第48页)

笔头中”!好像这一生就是为了坐在书斋读书写书才来到这人世间。也许这是书生的宿命,身为读书人,就必得不停地写,写了以后还得设法让人知道,(以此来证明那一点点这那,换取那一点点这那)。所以符葆森说,宋湘的《说诗八首》之八“可为千古儒生同声一哭”(《寄心庵诗话》)。

五言古诗是仅晚于四言诗而兴起的古体诗,假如以之表达尚无为的思想,表达时又不

求几个字讲一层意思的整齐,那么这首诗很可能是自然古淡的。如果诗中又能发一点具有一定真理性或概括性的议论,那么诗就将再带一点厚实。本诗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口语化地谈了一种道理,结尾又回到老庄的大道世界里去,所现的风貌也然也就是古淡厚实了。

(作者: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上接第11页)版摹印,后跋脱佚。泰兴季氏藏本。令人遗憾的是,据1926年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载,二百余种宋元明板书籍及一千余件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皆属天禄琳琅秘籍精品,大都移运宫外,不知下落。其中就包括《天禄琳琅书目》记载的四部宋版《玉台新咏》。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大图书馆还未发现藏有宋版《玉台新咏》,这几部宋版《玉台新咏》的下落如何,看来又是天壤间一个待解的谜了。

⑤ 参见吴世昌先生《晋杨方〈合欢诗〉发微》,载《文史》第三十五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另外朱谦之先生《中国音乐文学史》第五章“论乐府”也对《玉台新咏》的音乐性质作了初步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重印本。